

366425

(沪)新登字 101 号

责任编辑 周琪生

封面装帧 杨德鸿

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史

·上 编·

蓝 瑛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25.5 插页5 字数582,000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7-208-00991-0/D·190

上、下编定价 40.85 元

序

王松 姜琦

社会主义学说问世于16世纪初期。以莫尔的《乌托邦》(1516年)为标志,它经历了470多年的发展过程。这期间,社会主义学说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构想到建立现实的制度,又从一国的理论和实践发展为带有全球意义的理论和实践。一种学说,历经近5个世纪而长久不衰,影响愈益广大、推动了数十亿人口的实践,仅此而言,研究它也是极有意义的。

社会主义既是一种学说,又是一种运动、一种制度。社会主义学说是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中发展的,因而研究社会主义学说离不开对社会主义运动 and 社会主义制度的研究。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不仅仅因为它在理论上剔除了空想的成份,更因为它找到了推动社会主义运动的物质力量,他能够在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也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曲折和社会主义制度面临挑战都毫不足怪,它要求我们更深入地结合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史来研究社会主义的学说史,从理论上总结经验,从思想上坚定信念,在新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

社会主义学说是在斗争中发展的。这种斗争反映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内,是既和来自外部的社会主义的敌人作斗争,又和

来自内部的错误理论和错误思想作斗争。社会主义学说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它在斗争的同时也批判地吸收着人类已有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来自敌人那里的经过改造的一小部分合理的成份。研究社会主义学说史，分辨社会主义学说在斗争中坚持了什么、改造吸收了什么、精粹是什么和在发展中扬弃了什么，显然对于今天和今后社会主义学说、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发展也是大有裨益的。

社会主义学说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学说、社会主义经济学说等众多具体的内容。我国 30 年代就有吴黎平的《社会主义史》，50 年代又有陶大镛的《社会主义思想简史》，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新出了《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空想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史话》等 10 几种著作。但这些著作或者兼容并包、或者突出经济学说，都未能对社会主义政治学说作深入的专题研究。《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史》的作者们抓住了社会主义政治思想的发展这个专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空间上全面论述西方、东方以及中国的各种社会主义政治学说，时间上从 16 世纪初一直论述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不失为社会主义学说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成果，这也填补了我国社会主义研究中的一块空白。

这部洋洋洒洒 100 万言的巨著分为上、下两编，共 4 卷。通观全书，我们认为这部著作有着明显的特色，具体表现为：

第一，主题鲜明。全书突出阶级、政党、国家、革命、政权、政治体制、政策、策略等方面的学说、观点，经济方面和文化教育方面有所涉及，但篇幅不多，主次安排得当。

第二，脉络清晰。全书按照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发展的历史进程，顺序论述空想社会主义的政治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学说以及当时和科学社会主义并存的其它社会主义政治学说，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社会主义政治学说、战后的社会主义政治学说，4个发展阶段分为4卷铺开，脉络一目了然。

第三，材料翔实。全书注重第一手资料的搜集，国内、国外资料广征博引，但又不是资料堆砌，以人物导思想、以材料导观点，有见解，有新意。

第四，纵横比较。全书以人物为单元，章节大多按人列章、按人列节。这样，不仅作者对不同人物、不同观点的评述言出有据、论出有名，也更有利于读者作出自己的比较、分析。

《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史》作为国家“六五”计划哲学社会科学的重点项目，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从整体上看堪称是一部力作，优秀之作。相信它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承上海人民出版社之约，在推荐之余，特作如是言为序。

出版说明

一，本书系哲学社会科学“六五”期间国家重点项目(政治学科)，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及其所属情报研究所，以及上海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上海市委党校，上海师范大学，空军政治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教育学院等单位有关人员参与协作，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上述单位领导的支持与协助。

二，本书共四卷、卅章，加导论与结束语。分作上下两编出版。上编包括导论与一、二卷，下编包括三、四卷与结束语。时间范围包括自16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政治学说的诞生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止。

三，本书主编蓝瑛，分卷主编：柳振铎(第一卷)，吕裕国(第二卷)，陈鸿寿(第三卷)，吴耀辉、程可超(第四卷)。并由主编、分卷主编及刘国华(上海科社学会)七人组成编辑委员会，以及由谢宗范、朱坚劲、徐觉哉组成的小组，进行了对编写工作的组织与协调。

四，本书各章执笔人：《导论》(蓝瑛)，第一、二、三章(万中一)，第四章(柳振铎)，第五章(朱坚劲)，第六章(顾学杰)，第七章(朱元寅)，第八、十章(朱坚劲)，第九章(吕裕国)，第十一章(崔正起)，第十二章(周学斌)，第十三章(刘惠民)，第十四章(魏仲端)，第十五章(徐觉哉)，第十六、二十一章(杨章明)，第十七、十八章(陈鸿寿)，第十九、二十章(周纪良)，第二十二章(程可超)，第二十三、二十五章(沈永林)，第二十四章(刘国华)，第二

十六章(丁珊、田作高),第二十七章(吴耀辉),第二十八章(吴耀辉,魏永征),第二十九、三十章(吴耀辉,蓝瑛,郁景祖,田作高),结束语(蓝瑛)。

五,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有关学术单位,专家的关心支持,王松、王邦佐、姜琦等同志多次参与讨论,提出宝贵意见,并由王松、姜琦同志为本书作序。全书定稿与出版中,上海人民出版社热情支持,周琪生同志直接参与全书修改定稿,荆位祜、万中一、朱坚劲、周纪良等同志也参与分卷的修改定稿。

六,在本书出版前,已由蓝瑛、谢宗范主编的《社会主义流派政治思想述评》及《社会主义政治学说文集》两书,作为本项目的阶段产品,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1990年6月

导 论

蓝 瑛

编写这一部《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史》，是为了在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开拓一个新的领域，这就是着重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研究社会主义思想学说的发展历史，把社会主义研究和政治学理论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我们进行这样的探索，既是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需，更是适应于社会主义实践的要求。因此，这里想说明三个问题：一，社会主义政治学说的概念、对象和基本范围；二，社会主义政治学说的发展线索及重大理论问题；三，本书的编写体系及特点。

(一)

社会主义政治学这门学科，近年来已经引起国内理论、学术界的重视，但作为这门学科建设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史，却仍然是一块有待开垦的处女地。长期来，尽管在国内外都已出版过数量众多的有关“政治学说史”或“社会主义思想史”这一类著作，却未见到一本系统论述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史的专著。应该怎样解释这个现象呢？这就需要对政治学说史、社会主义思想史、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史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一点分析。

在政治学说史中，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史应该占有什么样的

地位？在目前大量的政治学说史著作中，虽然也都列入了社会主义政治学说的内容，但所占比例甚少，而且往往是摆在从属于西方各类政治学说的地位，并不能真正反映出社会主义政治学说自身发展中的独立体系。这说明，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存在着一种“跛足”现象，即由资产阶级或剥削阶级政治学说占着统治地位。列宁曾经论述过人类社会政治思想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提出了“剥削的存在，永远在被剥削本身和个别‘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一些与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①。事实也正是从产生阶级、阶级社会开始，就存在着反映剥削阶级利益和反映被剥削阶级利益的两类相对立的社会、政治思想之间的斗争。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而同时出现的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已经经历了470多年的发展历史，有其从低级到高级，从空想到科学的逐步深化、不断变化的独立发展的体系。因之，加强对于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史的系统研究，就要把社会主义政治学说放在一个独立发展的体系上，既反映它与各类剥削阶级政治学说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斗争的复杂关系，又着重反映它在自身发展中各种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的不断深化和丰富的历史过程。这应该是社会主义政治学这门学科建设中的重大课题，也应该看作是进一步克服和摆脱剥削阶级政治学说史的局限性、狭隘性，来完整而系统地反映人类社会、政治思想发展的全貌，建立起政治学说史的科学理论体系。

那么，是否可以用“社会主义思想史”来代替“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史”呢？社会主义思想史当然是包括了政治思想学说的内容，目前已经较多地出版了这方面著作，同样反映了对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学说研究中取得的许多成果。但是，长期来以这种综

^① 《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列宁选集》第1卷，第394页。

合的“社会主义思想史”完全替代从专门学科角度来研究社会主义理论的状况，已经愈来愈不能符合当代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要求。由于当代社会主义实践模式和经验的进一步多样化，也要求对于社会主义的科学研究，必须从方法上、体系上、结构上来一个大的变革和突破。按照传统的方法，我们已经习惯于把科学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份之一，把它和政治经济学、哲学并列为三门学科，这样的分类方法，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特点。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经典著作中，也没有把政治学作为独立的学科来专门研究，他们丰富的政治思想、理论，正是和他们的整个理论体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三个组成部份的分类，有其存在的历史原因，在今后也不可能完全废弃。但另一方面，正是从深化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使之与当代社会主义实践和新的时代发展更紧密结合的要求出发，有必要更多地采用把社会主义理论和各门学科研究相结合，分别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等角度来研究社会主义的理论及其发展史。这也应该看作是促使社会主义理论与当代现实相结合，并实现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向和在研究方法上的革新。

从上述认识出发，我们对社会主义政治学说的研究对象及其基本范围作些探索。我们认为，作为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它与一般政治学的研究对象、范围既有共同点，又有一系列特殊性，我们需要着重掌握它区别于一般政治学的特殊内容和范围。

政治学说的共同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现象、政治关系和政治斗争，而又集中表现为国家权力、国家管理以及对阶级关系的系统研究。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同样是在这个共性的基础上，又有其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政治学说的根本特点。它是以批判私有制、实现公有制为基本理论形成的政治思想学说，经

历了从空想社会主义发展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它在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革命实践日益结合的基础上，成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理论武器，通过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斗争，来实现改造旧制度、建设新社会的革命目标和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因此，它的革命性、阶级性、实践性，就是它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政治学说的根本特点。在它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它吸收和改造了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一切进步成果，特别是科学地接受和改造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切思想理论成果，成为对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学说的继承、发展和革命改造；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它又是历史上一切被剥削阶级斗争在思想、理论上的表现，特别是在19世纪中期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历史条件下，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武器，它的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现实基础，都随着实践斗争经验的积累，来不断地完善、丰富或改变、修正它的理论观点。到伟大的十月革命之后，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又标志着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它与建设新社会制度的实践相结合，带有更为直接的现实性，成为研究和探索社会主义社会中政治关系、社会阶级关系的发展规律，以及直接为巩固、完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服务的一门政治科学。

正因为如此，在确定社会主义政治学说的对象和范围时，不可能仅仅停留在一般政治学的定义和概念上，而是要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基本特点出发，来确定其基本内容和重点。我们对此概括为六个方面的重点，包括阶级观、国家观、民主观、革命观、政党观以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国际政治观，其中又以国家观和革命观为其核心，也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实现共产主

义、解放全人类的远大理想的学说,这就是构成社会主义政治学说的基本内容和范围。

以上所述,是我们对“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史”的一些初步认识,并以此作为编写本书的指导思想。

(二)

社会主义政治学说的诞生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和早期无产阶级的出现为其社会历史条件。1516年英国的托马斯·莫尔发表《乌托邦》一书,也就是社会主义政治学说诞生的标志。对470多年来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史,如何科学地进行历史分期,来揭示它的基本的发展线索,这是首先需要分析的。

社会主义政治学说作为社会主义思想、运动的组成部份,在历史分期问题上,它们之间应该是统一的。国内外出版的大量“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思想史”的著作中有各种分期标准,并未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我们认为从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要求来考虑,以社会主义史上的三次飞跃为标志,即从空想到科学的第一次飞跃,从理论变为现实的第二次飞跃,从社会主义的一国建设到多国建设的第三次飞跃,将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史划分为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社会主义在一国建设,以及社会主义在各国建设这四个历史时期,这是比较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过程的。其中尤其需要突出十月革命的重大历史意义,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使社会主义政治学说与建设新社会的实践结合起来,开始了社会主义理论通过实践检验、深化和丰富的过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也就出现了当代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上的多样化、民族化的新趋势。因此,在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史的研究中,必须充分地反

映出它在发展中的这些基本规律和基本特点。

社会主义政治学说的发展，以一定时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阶级斗争的状况为其物质基础，但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又有其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相对独立的继承性。因此，社会主义政治学说的发展，一方面，它必然是和其他各种政治思想学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斗争的种种复杂关系；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政治学说中又曾出现过各种流派和各种代表人物之间的种种分歧、对立或争论，也有相互吸收或相互渗透的过程。一部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史，需要根据思想理论上的这种错综复杂的状况，作出科学的比较分析，才能理出它的基本的发展线索来。在本书中，我们大致是围绕着十个方面的基本理论问题，试图对社会主义政治学说的历史发展作出基本的概括。

第一，社会主义政治学说渊源于 古代的“平等观”、“公有观”

社会主义政治学说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基础上产生的社会、政治思想，但它的思想、理论渊源，则应该上溯到古代的“平等观”、“公有观”，这可以看作是一切社会主义思想的萌芽形态。它经过不断的改造发展，使之从空想变为科学，从理论变为现实。研究社会主义政治学说的来源，需要对古代的“平等观”、“公有观”作出科学的解剖。

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伴随着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展开，同样也就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出现了敌对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国家的奴隶起义、农民战争中，都提出过反映被剥削阶级利益的政治主张、政治口号，也包括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各个时期被剥削阶级的政治愿望、政治理想，它的思想

理论形态的集中表现就是“平等观”、“公有观”。在西方,有对“黄金时代”的憧憬,有原始基督教“千年天国”的传说,人们在教徒团体内实行过财产公有,平等互助;中世纪的平民、农民中更加明确地提出以建立平等的社会关系为政治目标,宣称“社会根本祸害是财富及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英国中世纪农民起义领袖约翰·博尔)。在中国,古代有“大同世界”的向往,发展到历代农民起义中提出了“太平世界”的理想,从东汉末年太平道的“人无贵贱、皆天所生”的思想,到宋朝王小波、方腊和钟相、杨么起义中,明确提出“均贫富”、“等贵贱”的革命口号等。它们出现在不同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以鲜明的“公有”、“平等”思想,与当时一切剥削阶级所鼓吹的“君权神授论”、“等级论”的政治观点相对抗。在当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中,也从“安民利国”的要求出发,提出过种种改善劳动人民处境和“均贫富”的治国措施。像古代希腊柏拉图那样,作为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也主张在维护奴隶制基础上的“理想国”,实行奴隶主阶级的公有制,他的思想同样成为后世社会主义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来源。“平等观”、“公有观”的政治社会理想,成为古代劳动人民反剥削、反压迫斗争中的鼓舞力量,对于推动社会进步起过重大作用,它将永远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份重要的精神财富。

当然,古代的“平等观”、“公有观”,并不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身,它也只能是在当时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反映当时奴隶阶级、农民阶级要求自身解放的那种朴素的、空想的愿望,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的局限,带有它的原始性、落后性。他们提出的种种主张、观点,还不可能成为一种理论形态,或明确的政治纲领。他们对人类前途的美好愿望和向往,带有各种违反历史发展的消极因素,表现为复古主义、禁欲主义、平均主义以及浓厚的宗教色彩,往往把对现实的反抗建立在历史倒退的幻想中,所

谓“黄金世界”、“千年天国”、“大同理想”，就是一种对古老原始社会的美化和迷恋；他们的社会平等和财产公有的思想，也只是停留在消费、分配领域的平均主义、禁欲主义，并不是建立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历史进步的基础之上；他们的浓厚的宗教色彩，更不是改造社会的具体目标，只是把人类解放寄托在“上帝降世”、“替天行道”的梦幻之中。因此，古代的“平等观”、“公有观”和后世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在本质上有区别的，对古代的“平等观”、“公有观”的思想进行不断的、彻底的改造，使之建立在科学地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形成为科学的“公有观”、“平等观”，这就是470多年来社会主义政治学说不断发展，不断深化，逐步地建立起科学的理论体系的一条基本线索。当代社会主义同样还在经历着把“公有观”、“平等观”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进一步的认识和实践的过程之中。

第二，人本主义、理性主义、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和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从本质上来说，是两种对立的思想、理论体系。但是，社会主义政治学说的产生与发展，却又是受到了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的各种政治学说的强烈影响。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本主义思想，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和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思想，都成为产生社会主义政治学说的重要的思想来源。历史上出现过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大多经历过从接受人本主义或理性主义的思想哺育和启示而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的过程。因此，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和人本主义、理性主义之间，存在着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的关系，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从联系中看区别，从相互影响中划界限，这是科学地研究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史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资产阶级思想家高举起人本主义、理性主义的旗帜，进行批判封建主义的斗争，这在人类政治思想史上，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从14世纪开始到16世纪达到高潮的文艺复兴运动，提出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思想，矛头指向腐朽的神学和封建制度，以人权代替神权，以人的世俗世界代替神的天堂，以人的个性解放、理性经验代替神学的蒙昧主义、禁欲主义，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①从人本主义发展到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理性主义，就带有更完整的理论形态和政治色彩，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强大思想动力。它提出的“理性原则”、“自然权利”、“天赋人权”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成为摧毁封建专制政治制度的强有力的理论武器。恩格斯在评论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伟大历史作用时指出：“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②应该承认，离开了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人本主义”“理性主义”的批判地吸收和改造，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政治学说的产生和发展，人本主义、理性主义不仅成为社会主义政治学说的重要的思想、理论来源，而且也正是被吸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政治学说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但是，科学地认识人本主义、理性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要认识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历史上的社会主义思想家，都经历过对人本主义、理性主义思想从接受到超越，从吸收到批判的过程，这里我们需要着重分析空想社会主义思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72年版，第445页。

② 《反杜林论》，第14页。

想如何经历这一过程，这就是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在它的初期发展中，已经形成的与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之间的理论界限。

1. 运用理性主义武器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从“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来揭露资本主义制度是违反理性的制度，这就与启蒙学者鼓吹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普遍幸福的理性社会相反，把理性原则和推翻私有制、消灭阶级剥削、实现公有制原则的改造社会的目标结合起来。这虽然仍然是从伦理道德观出发的政治理想，而理性主义本身并不能成为科学的社会发展观，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超越了启蒙思想家的阶级局限性，为社会主义政治学说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铺下了第一块理论基石。

2. 从争取政治平等扩大到要求社会平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平等思想”、“平等权利”，针对封建专制的特权统治，是为实现资本主义制度。它只是限于政治权利的范围，且仍然以维护阶级统治、阶级压迫的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为目标，也不可能真正实现政治上的平等权利；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则对平等的理想充实了阶级的内容，从维护劳动阶级利益出发的平等观，把政治平等扩大到社会平等。巴贝夫发表了著名的《平等宣言》，提出了“自由”、“平等”和“以劳动为基础的公众福利”的平等共和国的目标，恩格斯对此作出评价说：“……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开始把公民的平等提到首位以来，法国无产阶级就针锋相对地提出社会的、经济的平等的要求，这种平等成了法国无产阶级所特有的战斗口号^①。”他还称巴贝夫的思想是给“平等作了当时最进步的结论”。在其后三大空想家的论述中，都对社会主义的平等观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圣西门提出实现完全平等的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6页。

则是要“否认一切以出身为基础的权力，不承认各种特权”，而且在分配问题上体现个人收入应和他们的才能和贡献成正比。傅立叶则把劳动权作为“最主要的天赋人权”。欧文提出“人人都要参加一定的有益劳动”，作为实现平等权利的根本保障。因此，把平等权利和改造、消灭阶级剥削联系起来，这就是社会主义思想家区别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根本界限所在。

3. 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批判。最早揭露资产阶级共和国阶级实质的是英国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家温斯坦莱。他针对资产阶级宣扬的所谓“公平”政府、“民主”法律，尖锐地指出：无论是王国时期、还是共和国时期，其基础是一样的，它们都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土地）私有制之上，这就是“产生使人民陷于贫困之中的一切战争、流血、偷窃和奴役性法规的原因”。巴贝夫在揭露法国大革命后建立的第一共和国时，更明确指出国家政权仍然是掌握在有产阶级手中的工具，一切政治机构和社会团体是为有产者压迫和掠夺劳动人民服务的。“对人民来说，革命并没有完成”。圣西门还对 1789 年 8 月 27 日法国制宪会议通过的《人权宣言》，进行了深刻的评述：“被人们认为可以解决社会自由问题的人权宣言，实际上只是公布了宣言而已”。他的结论是法国大革命只是产生了“新的奴役形式”，法国社会也仍然是“一个是非颠倒的世界”。

因此，在文艺复兴和法国革命思想影响下出现的一大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突破了、超越了资产阶级思想家的阶级局限性，这在人类社会、政治思想的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从总体来说，他们还是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仍然没有彻底摆脱人本主义、理性主义的束缚，因而不可能形成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彻底地进行对人本主义、理性主义的改造和批判，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来完成的。